

香波文

目 录

人 物	诗人伍禾小传	张恭华	杜振武	1
	革命烈士韩寿槐		林明幸	5
	从剃头兵到振威将军			
	——记王正起发迹前后		王新生	9
	叶蓬扶闻		王士毅	14
	阮齐扶事		唐 风	23
	武汉大流氓杨庆山		龙从启	30
事 件	“洪帮大爷”周汉卿		明 夷	47
	李汉鹏其人其事		程文先	54
	柏叶事件		程文先	58
	壮志千古留柏叶	丁和岚	喻永生	63
	达义村“六·二二”日寇暴行纪实			
		刘锦祥	明德运	66
	建安集“二·二六”惨案	钟生文	张介眉	71
秘 闻 轶 事	何应钦“化干戈为玉帛”的真象		游宙儒	137
	胡瑞澜其人及和“杨乃武与小白菜”			
	一案的关系		张恭华	140
	日伪黄陂县肇民合作社始末		胡仲铭	149
	国民党湖北省水警局电台见闻		李义聪	153

烽火岁月	雨台山之战		
	——童年时期见闻	魏书富	77
	抗战时期黄陂县参议员座谈会侧记	阮永康	82
	“仙台寺”与合作抗日	刘芳良	87
	锄奸记	邓达五	91
	王昌贵营救“盟军”驾驶员脱险记	彭光楣	99
	歼敌夺粮记	杨启龙	102
	智擒小日人余才学	邓达五	105
	解放战争时期黄陂地下交通站	易行之	109
	国民党青年军203师被歼记	张藻	125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黄陂县政权琐记	刘明远	130
故情往事	故乡是传统铸成的	彭邦楨	160
	双十记小	周君亮	165
	西陵读书记	王芸孙	171
	思念校长胡秋原先生	张华荣	178
	将军千里寻战友		
	——记韩先楚与丁平喜患难深情	丁和岚	183
交史	陈仇九兴办黄陂小铁路始末	陈庆存	189
西陵小景	“武湖烟涨”与烟波亭	张慕华	215
	木兰古寨	黎世炎	218
	留园小记	胡仲铭	221

文 化 教 育	湖北的梅兰芳 —— 江秋屏	屠海风	195
	从灯戏说起		
	—— 琐谈王家福与王家长冲戏班	张伯坝	198
	黑李湾的鳌鱼灯	李幸才	202
	前川中学回忆	张 翼	206
木 兰 百 业	解放前黄陂城关地区教育界的派系斗争		
		刘述果	209
	制锣大王高洪太	彭光明	223
沧 桑 篇	黄陂豆腐	颜学甫	226
	解放前刻字匠的辛酸	颜学甫	230
	三里桥乡的来历	梅云阶	234

诗人伍禾小传

张慕华 杜振武

诗情奔涌的扬子江，孕育着诗情浓郁的武湖；诗的乳汁哺育了现代著名诗人——伍禾。

伍禾，原名胡德辉。1913年11月出生于武湖沙口楼子墩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丰富的古典文学的熏陶。

早在湖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在左翼革命文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开始新诗创作。从1933年起，先后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及武汉各报刊上发表作品，还自费刊印一本诗集《梦之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怀着满腔爱国情、民族恨在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担任《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1938年参加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辗转于鄂西北、河南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后又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随队南下，直至香港。

1940年初，他返回桂林，先是在广西省艺术馆工作，以后又在两所中学任教，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在桂林的五年中，他除在《抗战文艺》、《文艺生活》及当地报纸副刊上发表作品外，还先后出版了短诗集《寒伧的歌》、长篇叙事诗《箫》；并和同在桂林的诗

人、作家一起出版了《二十九人自选集》。1942年的端午节，为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还创作了一部清唱诗剧《汨罗江边》，由音乐家陆华柏谱曲上演，曾赢得观众和文艺界的一致好评。

1944年，桂林沦陷前夕，伍禾和原在桂林的文艺界人士一同辗转流徙到了重庆，先在南天出版社工作，以后又在重庆钢厂子弟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伍禾从重庆经川湘公路回到武汉。同年8月，他接编《新湖北日报》副刊《长江》，并担任副刊编辑室主任。1948年参加中原军区情报处情报工作，一直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在此期间，他虽写诗不多，但却以“纪烟”、“苏眉甥”、“劳人”、“上官来”等笔名发表了不少政论性的杂文；并通过副刊，联系和培养了一批进步的青年作者。

从1950年起，他担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并兼任《湖北文艺》主编。1953年担任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1954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期间，由于工作繁忙，他很少写诗，但在苦心开辟的《湖北文艺》这块园地上，培育出了许多新的工农业余作者，为繁荣湖北的文艺创作，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1952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夙愿。

不幸的是，在1955年的“反胡风集团”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先后两次蒙冤受屈，被错划为“分子”，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

1962年，他被调回湖北省图书馆。但从事创作的权利被取消了，诗人的心窗被封闭了，诗人的歌喉被扼制了，诗人的激情被压抑了。然而在这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怀着眷眷于文学创作之深情，勤勤恳恳地从事他的鲁迅研究工作。

更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伍禾又受到了较前更猛烈的冲击和更残酷的批判。他珍藏的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作品，都被洗劫一空，至今下落不明；而他，也被这场浩劫夺去了生命，于1968年12月22日离开了人世，终年55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伍禾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推倒了历次“运动”中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并于1981年3月在武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历史为诗人作出了公正的裁判；诗人也定会含笑九泉，放歌地下了！

至于诗人伍禾的人品及其诗品，他的老战友、现代文坛著名作家和诗人聂绀弩曾作过精辟的评价：“伍禾是个诗人，不，伍禾是首人诗。”他的另一位战友、著名诗人曾卓也高度的评价：“伍禾直率、热情，爱爱仇仇，具有诗人的性格”。特别是对他处于逆境时谈到的“从大处看，光明在望，从小处看，黑暗愈浓”的见解表示由衷的赞赏，热情地称许：“这是真正的诗的语言”，“也是一首真正的散文诗”。

回顾伍禾一生的战斗历程，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一生是为民族的解放而讴歌、呐喊的一生。早在1935年冬，诗人就为“一二·九”学生运动而振臂高歌（《十二月的江边》）。他以“愤怒的感情”痛斥那些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握着权柄的人”。并无数地发出“我们从民间来，我

们要回到民间去”的呼喊，“要以革命的热情，把种子撒播下去”，要做“纵火者”，让祖国的大地，“七处冒火，八处冒烟”。这是他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诗句，也是他对祖国虔诚的誓言。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祖国的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时，他就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

伍禾著名的长篇叙事诗《箫》，是他回忆和纪念他父亲胡文叔的挚友——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肖楚女而写的力作。他崇拜烈士，歌颂烈士，誓为烈士未走完的征途和未竟之事业而奋斗到底！

伍禾又是一位勤奋踏实的工作者。在重庆，一个名噪一时的南天出版社，谁也想不到只有他和胡风二人。胡掌握社务，他负责一切杂务。当时“南天社”出版了不少长篇巨著，每一篇著作他都坚持不懈地反复进行校对。收书、送书，核算等所有的杂务，都由他一身担当。当时由于通货膨胀，生活不保，他还兼任《客观》周刊的校对，真是不舍昼夜，废寝忘食地工作。连他的好友聂绀弩、骆宾基登门走访，他有时竟不得不下“逐客令”。

这样一位有才华、有事业心、有奋斗精神的好同志，不幸过早的去世了，实在令人遗憾和惋惜！但令人欣慰的是，他的诗集《行列》在他辞世之后终于问世了。诗，就是诗人的生命。诗人生命之火花将在祖国的大地上，放射出他留给人间的光和热！

革命烈士韩寿樵

林明章

韩寿樵烈士，系我戚友。幼年时代我和他同窗共读，形影相随，成年后接触亦多，感情甚笃。他为人正直，疾恶如仇，为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灿烂的青春！

韩寿樵烈士，本名光林。1922年春出生于黄陂韩集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幼习经史，天资颖悟，过目即能成诵，虽受业私塾，却颇爱新知识、新文化，对西方文学（译本）、报章时事，无不尽力搜集，细心研读，每至忘饭。他随当地有名塾师林继忠至蔡官田、林家田等地就读，结识了蔡大经（辛亥首义元勋蔡济民之子）、周裕民等进步青年，深受新思想的熏陶，在他心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记得当时，他曾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工整地写着一副对联：“铁血世无俾斯麦，铜头我愧惠林吞”。可见其爱国思想之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极为不满，曾写一联寓其愤慨云：“弃战地，失边疆，宁拂民意毋宁死；抛头颅，洒热血，不雪国耻誓不休！”武汉沦陷时，何某在报纸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他读至文中“白发苍颜，霹雳晴天传噩耗；青春少妇，凄凉日夜泣空闺”时，义愤填膺，立志抗日。当时我地尚无正规抗日武装组织，只有一些出身兵痞，占地为王的土匪集团，如江铁狗、袁绍其、梅驼子之流。他们收

集国民党退却时沿途遗弃之枪枝弹药，各据一方，你争我夺，鱼肉乡民，并不真正抗日，寿樵同志对他们也恨之至极。当新五师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展到陂安南时，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斗争。

韩寿樵同志开始系一般工作人员，在刘浩、许绍贤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外围革命活动。为了适应斗争环境的需要，他常持维持会印制的“良民证”化名为韩华，乔装成商贩，多次深入黄陂县城内，侦察日伪活动情况，为边区提供了不少可靠情报。他曾多次奉命下汉口购运药物、蜡纸等，供边区的需要。1942年冬，他赴汉口找到一位文具店的乡亲喻家青，秘密购到掘井洋行油印机一部，约定时间，托其运至五通口取货。他在五通口等候三日，未见货到，心中十分焦急，于是忙雇民船赴汉问讯，亲手荡桨，不慎坠入江中，几乎淹死。及至挣扎泅水上岸，得悉货已运到后，他不顾衣湿身寒，负货摸着僻道，连夜赶送至陂安南县人民政府，交与彭鹤龄（又名彭何能）同志。

1943年，他已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当时，陂安南缺乏武器，民兵组织难以有效的御敌，于是他和刘浩同志计议，派汤永吉和一位精干的女同志，深入武汉，通过内线秘密购得手枪四十支，轻机枪一挺，子弹数箱，藏于木船载运的黄豆下，为安全计，又在长江里捞起老年男尸一具，置于船内，汤和那位女同志两人披麻戴孝，佯扮作送父亲遗体回乡。因而顺利地通过了日伪关卡，直运到六指店袁家汉，转至边区。

1944年秋的一天，他随刘浩同志夜赴武湖区的大咀收税，这里盛产银鱼和各种鱼类，是我边区税收要地，但当地

鱼霸鲁氏兄弟，平时横行乡里，勾结日伪，欺压渔民，拒交税款。该晚，刘浩同志设计，先令寿樵同志前往鲁家借宿，鲁霸见他是文雅少年，坦然召入。不料，刘浩同志尾随在后，当即举起手枪相示，鲁惊慌不已，经刘简告来意后，鲁霸连声称罪，表示愿交清应纳之税款。寿樵同志即取出纳税收据，并令交边币（那时敌战区流通货币是日钞、储币或法币）。鲁霸为了保全性命，只得按边币折合银元数百元交纳税款，还当场写出认罪书。这就是当时脍炙人口的“刘韩夜惩鲁霸”的故事。

韩寿樵同志禀性坚毅，爱憎分明，他任圣泉乡乡长时，矢志造福于民，深为群众爱戴。一次，蔡榨街上柴行经纪蔡老七（地痞），勒使韩德庆父兄五人，将柴薪送往许家桥伪保长家，否则不准出卖。他获悉后，前往柴行，严肃批评蔡老七资敌欺人行为，并折其秤杆以示惩戒，颇快人心。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他正直公道，调处得宜，果断利落，常用风趣语句作结语。对此，当地人民至今提及，仍称颂不已。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边区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关于各根据地部队和地方人民武装向附近敌据点进行纳降工作的指示精神，积极就地进行纳降工作。寿樵同志奉命组织民兵配合地方武装，包围骆驼铺、许家桥的日寇据点达三昼夜，后因国民党“出山摘桃”，派出大批军队“确保各据点日伪人员的安全”，与我发生摩擦。我方以民族团结为重，主动撤退，虽纳降未果，但使人民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嘴脸。

9月中旬，国民党黄陂流亡县长蔡谦由礼山经黄安七里坪回黄陂接收，护送蔡之武装，有个特务连，另加县大队。

途经周裕湾时，枪杀了我方张先炎等武装人员七人，还打死了一名百姓。下午，蔡谦逼近连三楼，这时韩寿樵同志正和几位干部在该村开会，不料顽军突至。此时，他正患疟疾发高烧，民兵队长龚仁章急忙背他至村北松林中去隐蔽，后卫民兵鸣枪阻击敌人，因敌方人多弹足，蜂涌而上，情况万分危急，寿樵同志为掩护民兵撤退，抱病上阵，阻击敌人，不幸受伤被俘，但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一伙贼人，历数他们假抗日，真反共，以及迫不及待抢夺胜利果实的卑劣行径。蔡谦闻之恼羞成怒，立即将他杀害。寿樵同志牺牲时，年仅23岁。

从剃头兵到振威将军

——记王正起发迹前后

王新生

晚清武将王正起，祖居长堰镇白龙寺村田铺咀。田铺咀旧属黄陂东乡，紧靠白龙山。白龙山是洪岗山支脉，曾建有黄陂八大名寺之一的白龙寺。与田铺咀相距仅一公里的山下王，村民全是王姓。原来田铺咀是个“庄屋”。当年的王正起家正是这庄屋的庄户（佃农）。他的祖籍是山下王。

王正起生于1830年（庚寅年），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曾带着他和三个弟弟讨饭度日。老二在他之前从军，后来倚仗他的地位当了个哨官。老三卖给了十公里外木兰山东麓湛海湾的蒋姓，改姓蒋。老么卖给紧靠田铺咀的台子吴，改姓吴。王正起立军功拜官，“报子”上门报喜时，他讨饭的母亲仍在山上挖柴。

根据清史记载和王正起家乡人民的传说，王正起是靠镇压捻军起家的。他既无文才，又无武艺，从事剃头生涯，由于不能维持生计，于1853年与山下王的族间兄弟王达夫（字学礼）一起从军。他从军后，仍在军营中为军士剃头。在一次与太平军交战中，清军抛下輜重逃跑。王正起因长一身疮，行走不便，被甩在后面，眼见不能走脱，他就跑到

土炮边，开了一炮。对方误认为清军有埋伏，慌忙退却；清军则以为援军已到，回师一击，获大胜。主将因这次战功，连升三级，王正起也升了三级，成了小官。

尔后，在山东镇压捻军的淮军向楚军借将，王正起应召同王达夫招募数百人经麻城、界岗、光山、潢川、周口北上。当时规定，到周口才可领饷。因此，沿途对老百姓小有骚扰。到山东时，王正起带的队伍虽早已衣甲不整，狼狈不堪，但他听说某协统久攻黄崖寨的捻军不下，则口出大言：

“饭桶，徒有虚名”。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楨是湖南籍，闻知此事，传王正起进见。因见王是两湖大同乡（湖南、湖北同属湖广），有心重用，就问：“你可进剿黄崖寨？”王答：

“有雄心，奈无实力。”丁问需要什么，王正起说只要大帅的20对大号。其时，一营兵一对大号，20对大号就是20营兵力了。丁宝楨听罢一笑，当即应允，撤了原协统，授给王正起20营的兵力，并发给双饷。

王正起领受20营兵后，让兵士整天抹牌赌博，到处闲逛，其实是借机刺探军情，麻痹捻军。如此半年，王正起也确实掌握了寨中不少情况，定下破寨之计。黄崖寨后面是悬崖，左右是窄道，前面是较平展的正道。那年腊月三十，平地积雪数寸，王探知捻军在寨中饮酒欢度除夕，就派一部分兵士夜间从后面攀到寨边埋伏，主力从正道吹号进攻。黄崖寨中捻军猝不及防，在黑暗中混战，自伤不少，王正起大获全胜。下令将捻军全部杀死。天明后，王正起用10辆四轮太平车载上捻军首级去向丁宝楨请功。他用捻军人头换来官爵，就任山东提督军门（家乡人至今称他王军门）。

1872年，黄河郛城侯家林段堤身告急，朝廷命王正起带

兵防堵，立下大功。据说，王正起办事果敢机智，在赴郢城途中即吩咐沿途收购白布，作联袋之用。到郢城后又大量收集高粱杆子，铡后与泥沙拌在一起装袋堵水，当溃口水猛流急时，他坚守阵地，身先士卒，先投自己的靴子，继抛头上的帽子，但水仍自咆哮奔腾。此时，王正起无可奈何，准备以身殉职，正当纵身下跳时，忽然上游飘来了两块大冰，溃口水速减慢，于是王正起振臂高呼，命令士兵民夫急抛沙袋，堵口成功。

王正起筑黄河溃口有功，朝廷赐赏加爵，晋升为二品振威将军。这时他的家势上升到了顶点：有妻妾7人，第七房夫人年十五；田连阡陌，东到蔡家榨前楼、余十八，南到县城附近。

王正起富贵后，曾于同治13年（1874年）在山下王修王氏宗祠一座。这座祠堂规模相当宏大，明三暗五，上下三重，108根楠木柱子落地，是黄陂少有的古建筑，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毁。他的住宅也几经拆建，面目全非。唯有他的副手王达夫为其祖母所立之墓碑现仍存山下王。碑文为“皇清诰封夫人晋封一品夫人祖妣王母汪太夫人之墓”，可作为他们两家显赫一时的证物。

王正起血洗黄崖寨，残忍杀死寨中的全部捻军官兵，惨无人道，后感内疚，因而传出“狗娃”讨债之说，从而反映了王正起杀害黄崖寨捻军的不安心理。

王正起死后，七房妻妾中有儿子的大房、三房、七房都分得一大笔家产。但都相继破产，而大房破产最快，败家子就是狗娃。狗娃是“大太太”生的，名王幼海，狗娃是小名，他出生时，王正起正在梦中。一天中午，王正起睡午

觉，看见黄崖寨主背了一个黄色包袱来讨债，急忙拔剑砍杀！惊醒，才知是南柯一梦。刚坐定喝茶，“大太太”房中丫环即来报喜。王忙问：“大喜，小喜？”丫环答以大喜（即生了儿子）；王即提剑到“大太太”房中砍杀，被护卫和家人劝阻住了。从此，“大太太”就不让这孩子同王正起见面。到了3岁，又送往前述之湛海湾蒋姓抚养，很少回家。那狗娃幼年就显出富家子弟“败子”的劣性，喜欢甩东西，打碎了细瓷碗就笑，没合意的东西供他甩就哭。长大了，他百无一能，只知败家，能一顿吃掉30两银子；用鱼苗挤汁，用麻雀胆冲汤。他提一包金银首饰去逛烟花院，让妓女们装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把金银首饰撒在地上，让妓女们俯身去抢，他看着取乐。狗娃挥金如土，家势很快就败落下来，后来连住房也卖掉了。住在祠堂里，40多岁就死了。死后无钱理丧，还是族人捐款安葬的。

王正起富贵后，并没忘记自己的穷苦出身，也许是要医他的“心病”，或者是兼而有之，做了不少好事。第一，他捐了几十石田办义济堂，赈济“龙凤会”的孤贫。龙凤会的范围大致相当现在的白龙寺、高炉钱、长堰、唐刘桥等行政村。办义济堂是因为“老太太受了惠的”（即王的母亲曾在这一带讨过饭，他要以赈济孤贫来报答乡亲）。后来，在义济堂内设了义济小学，直到抗战时期才由抗日民主政府将义济堂的田产收为“学田”。第二，捐田办族间义学。第三，捐田百余石在黄陂县城办“芹饷局”，在东乡办“小芹饷局”。这芹饷局，是为资助读书人赴考设立的。第四，在饥荒时还举办过放赈、施粥一类的善事。

王正起为官时，对乡亲也不摆架子，他骑马回乡，离家

老远就下了马，他早年贫贱受人责难、讥笑，做官后也不报复。

这些，至今仍传为美谈。